

译学新论丛书

主编 张柏然 许 钧

Logic 汉译研究

高圣兵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学新论丛

H059/89

2008

柏然 许 钧

Logic 汉译研究

—— 跨文化翻译中的“格义”、视域融合与接受

高圣兵 著

本书由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基金
资助出版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Logic 汉译研究:跨文化翻译中的“格义”、视域融合与接受/高圣兵著.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1

(译学新论丛书)

ISBN 978-7-5327-4403-9

I. L… II. 高… III. 汉语-翻译-研究 IV. H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6816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

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Logic 汉译研究

——跨文化翻译中的“格义”、视域融合与接受

高圣兵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25 插页 2 字数 234,000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3,250 册

ISBN 978-7-5327-4403-9/H·802

定价:23.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56401196

总 序

谈翻译,我们首先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翻译,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在人类的文化交流中一直在广泛地进行着,但在历史中却很少得到世人的关注;丰富的翻译活动,一直被实践者认为是充满障碍的工作,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却很少有学者对其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这两个方面情况的长期存在,或者说翻译领域被历史学界、被理论界长期忽视的状况造成的直接影响便是,翻译一直被当作一种“雕虫小技”。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语言学家对翻译问题不予重视,历史学家对翻译活动熟视无睹,知识界对翻译的认识几乎是零。这在很大程度上使翻译活动在两个方面被遮蔽:一是翻译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得不到足够的承认;二是对翻译的种种问题得不到科学、系统的研究。尤为耐人寻味的是,对翻译的这种轻视态度不仅仅来自翻译界的外部,而且还来自翻译界的内部。翻译界内部的这种自我定位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他学科对翻译的看法,渐渐地也在有关的学界形成一种偏见:翻译为雕虫小技,不登大雅之堂。因此,翻译的作用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对翻译的理论研究得不到学界的关注和支持。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才逐渐开始改变。

长期以来翻译家本身专注于翻译实践,忽视了对翻译问题的理性思考

与系统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个历史的误会。但是,丰富的实践与贫乏的理论之间所产生的这道深深的裂痕却不能完全掩盖在数千年的翻译历史中。翻译活动的特殊性提出了种种问题和困难,而面对这些问题和困难,翻译家们也不可能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因为它们是无法回避的客观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家们对翻译理论思考的忽视,并不说明翻译就没有理论研究的必要,也并不意味着翻译的种种问题因为翻译家的忽略便不存在。

事实上,在漫长的翻译历史中,翻译家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进行着形式多样的丰富实践,虽然对实践中所出现的问题,还没有以一种清醒的理论意识去加以关注,但他们针对这些问题所采取的种种手法、策略,他们在实践中积累的一些经验、体会,尤其是他们从中悟出的一些道理或原则,是一笔笔非常珍贵的遗产。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弥足珍贵的译事经验,由于学界长期以来没有予以重视与关注,像一颗颗散落的珍珠,被历史所尘封,无法发出其耀眼的光芒。

从上个世纪 50 年代开始,一批具有强烈的探索精神和清醒理论意识的学者,如前苏联的费道罗夫、英国的卡特福德、加拿大的维纳与达尔贝勒内、法国的乔治·穆南等,试图以语言学为指导,打开翻译研究的大门,将数千年来一直处在技艺层面的翻译经验纳入理论的思考、系统的分析与科学的探索范围。到了 70 年代,出现了以美国尤金·奈达为代表的一批翻译理论家,他们不断拓展翻译研究领域,将翻译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为翻译学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上个世纪 70 年代以后,翻译界的一批有识之士将目光投向被历史尘封的一笔笔珍贵的翻译遗产。他们一方面追踪历史上的重大翻译事件,将翻译家的实践置于宽阔的历史空间加以认识与定位;另一方面对伴随着翻译活动而产生的点滴思考与经验体会加以梳理与探讨。以现代学理对传统的翻译经验加以阐释,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深

化翻译理论研究的重要途径。同时,客观上也促使被历史遗忘或忽视的翻译活动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如果说翻译在历史上曾长期受到冷落,处于历史边缘的话,那么正是借助现代学理,借助哲学、美学、语言学、符号学、文艺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丰富并加深了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不断拓展翻译研究的领域,使翻译活动在历史的舞台上逐渐占据本应属于自己的位置,从历史的边缘开始走向中心。

在把翻译从边缘推向中心的历史进程中,语言学家们充当了先锋的角色。如费道罗夫、卡特福德、维纳与达尔贝勒内、乔治·穆南等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翻译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其贡献是多方面的。是翻译的语言学研究把翻译从经验主义中解放出来,为翻译研究打开了科学的大门,历史上第一次赋予了翻译研究科学的性质,将过去近两千年来一直在经验层面讨论或争论不休的问题置在科学的层面进行探讨。但翻译活动十分复杂,涉及的因素多,范围广,有关翻译的许多问题,如翻译者的主观因素、语言转换中的文化移植、影响翻译的社会、政治因素等问题,在语言学层面难以展开系统和深入的分析,得不出令人信服的答案,翻译历史上的众多现象也无法得到辩证的解释。翻译的语言学研究途径暴露出的这些局限,不仅使其他学科理论的介入显得非常必要,更为这些学科自身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探索空间。

当回过头去,对自上个世纪 50 年代以来翻译研究所走过的路作以回顾性的审视时,我们不难看到以下几点:一是翻译研究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其广度和深度都是在过去任何一个时期所未能达到的;二是翻译研究的途径得到不断开拓,各种翻译研究流派纷呈,出现了一大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三是翻译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与发展越来越受到其他学界的关注与承认。在国外,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起,就有学者开始对 50 年代以后的翻译理论研究状况进行分析与总结,如加



拿大的罗贝尔·拉罗兹、英国的埃德温·根茨勒,他们分别于1989年与1993年发表了同名著作《当代翻译理论》。前者以翻译所涉及的基本问题为核心,对上个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在翻译理论研究领域比较活跃的代表人物的观点与思想进行评述;后者则根据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至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状况,以不同的观点和重要著作作为依据,将当代的翻译理论分为“美国翻译培训派”、“翻译科学派”、“早期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和“解构主义派”等五大流派。香港的陈德鸿与张南峰编写的《西方翻译理论精选》收录了西方20位重要翻译理论家主要著作的部分章节的译文,这20位译学理论家中,除德莱顿、泰特勒、施莱尔马赫3位之外,其余17位均是当代的。根据编者的划分,西方译学研究界的这20位代表人物被列入6大学派:语文学派、诠释学派、语言学派、目的学派、文化学派、解构学派。除传统的语文学派,其余的5个流派都是近50年来发展起来的。在《西方翻译理论精选》的结论中,两位编者这样说道:“西方的翻译理论,除了语言学派和传统的语文学派之外,还有近一二十年才兴起或盛行的翻译研究学派,以及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学派,可谓百花齐放。”如果再把我们的视野扩大一些,还可列举出符号学派、交际学派、语言哲学派、文艺学派等翻译流派。从历史上长期以来“不入流”的翻译经验之谈到20世纪末令人眼花缭乱的翻译流派的形成,我们可以看到,翻译的理论研究开始或已经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时代。透过这些被冠以各种名称的翻译思想或观点,我们不难看到相同的一点,那就是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对翻译进行研究。以语言学的理论指导产生的研究成果被统称为“语言学派”,以女性主义理论为参照的研究,被冠以“女性主义翻译流派”,总之,一种理论的介入,从积极的角度讲,都会给人们认识与研究翻译打开一条新的通道。

借助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客观上确实为翻译研究拓展了巨大的空

间,为翻译研究注入了科学的活力,渐渐地从边缘开始走向中心。翻译,作为一种复杂的活动,涉及面广,若仅仅局限在一个领域对其进行研究,无法揭示其性质及活动规律。在这个意义上,翻译研究必定具有综合性。但是,当各种学科的理论介入翻译研究领域之后,当我们在为翻译研究由此进入全面发展而欣喜的同时,不能不看到在种种理论指导下取得的研究成果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如同“盲人摸象”,每一种理论流派所认识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片面性,揭示的只是翻译活动的一个方面,难以深刻地反映翻译活动的全貌。此外,在理论的层面上,从目前翻译理论研究的现状看,还出现了“理论+翻译”的两张皮现象,有的理论只浮在表面,难以真正起到指导翻译研究的作用。最为值得注意的是,翻译研究在引进各种理论的同时,有一种被其吞食、并吞的趋向,翻译研究的领域看似不断扩大,但在翻译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路途中,却潜伏着又一步步失去自己位置的危险。面对这一危险,我们不能不清醒地保持独立的翻译学科意识,从翻译学建设的高度去系统地探索翻译理论问题,而在上海译文出版社支持下主编的这套《译学新论丛书》正是向这一方向努力的具体体现。

《译学新论丛书》有着明确的追求:一是入选的课题力求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原创性,能为翻译学科的理论建设和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二是研究力求具有系统性,以强烈的问题意识、科学的研究方法、扎实的论证和翔实的资料保证研究的质量;三是研究力求开放性,其开放性要求研究者既要有宽阔的理论视野,又要把握国际翻译理论研究前沿的进展状况,特别要在研究中具有探索的精神,力求有所创新。但愿在翻译界同仁的支持下,在各位作者的努力下,我们的追求能一步步得以实现。

主编

2007年8月18日于南京大学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东西方逻辑文化源流	/3
第二节	逻辑学东传研究现状及本研究的方法	/9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框架和潜在的研究空间	/15
第二章	Logic 汉译史的文化描述	/25
第一节	Logic 东渐的历史文化背景	/27
第二节	Logic 的译名变迁	/63
第三章	Logic 的汉译与互译性“格义”	/81
第一节	“格义”的基本含义和特征	/85
第二节	“格义”的现象学分析	/106
第三节	“逻辑”的中西文化血统	/122
第四节	“格义”与 Logic 汉译染色	/137
第四章	Logic 与“逻辑”:跨文化翻译中的视域融合	/151
第一节	阐释之力:叩问 Logic 语义场域	/153
第二节	偏见参与 Logic 的跨文化解读	/167
第三节	东西方文化观照下的“逻辑”视域融合	/180

第五章	“逻辑”译名在中国文化中的合法接受	/ 201
第一节	翻译的哲学与哲学的翻译	/ 203
第二节	Logic 的中国形象	/ 218
第三节	语言接触与术语的旅行	/ 237
第四节	“逻辑”意义重构与合法接受	/ 253
第六章	结论	/ 269
第一节	历史语境与 Logic 翻译群体	/ 271
第二节	语词接受的社会性与中国思想的现代转型	/ 283
第三节	本研究的普遍意义和潜在空间	/ 291
	参考文献	/ 297
	后记	/ 311

第一章

绪 论

对处于频繁的文化交流之中的民族来说,翻译工作极为重要。它不仅关系到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也关系到本民族文化的发展与更新。纵观整个人类文化史,外来思想的翻译在汉语思想及语言的历史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个汉语文化思想乃至语言本身的演变均和翻译有根本性的联系。近代以来 Logic 等西方思想在汉语语言文化中的传播和接受对汉语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至今我们仍然在感受着中国与西方文化的接触所带来不可避免的强烈震荡。

本课题以 Logic 在中国的翻译、传播影响和接受为研究对象,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这一课题通过考察语词 Logic 的汉译流变,有利于揭示外来理论话语如何超越其自身语言的限制,与接受语言的文化实现视域的融合,从而以新的形态在接受语言的文化中被接受,并实现其“文化的重构”。

第一节

东西方逻辑文化源流

Logic 产生于以对理性解释的诉求为思维取向的西方文化,与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一样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对世界文化具有同样深远的影响,都是世界文化不可或缺、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但 Logic 与中国传统逻辑思想毕竟存在较大差别,这两者的遇合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自从明朝末年西方传教士把 Logic 传入中国以来,Logic 的译介格外丰富。

通过对译介(作为外来文化传播和产生影响的一种重要方式)进行归纳、整理、分析和比较,不仅可以清晰地显示 Logic(一种外来文化)的传播路径、语境,而且还能清晰地显示出在文化的对话中 Logic 与中国传统逻辑思想近 400 年来的相互碰撞、相互理解,以及交融、吸纳和排斥。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 Logic 在中国还是中国传统思想在西方,都因相互误释而出现文化扭曲与变形。

古希腊较为开放的地理环境,商贸相对发达的社会经济以及奴隶主民主制的社会组织,使古希腊文化具有“爱慧能、尚思辨、追求知识、探索真理”的精神。希腊人在向文明过渡的过程中,形成了这种独特的精神,哲学诉求成为其明显特征,求知成为其文化内核。古希腊在哲学、科学、数学乃至文学艺术上的成就,都与这种精神分不开,这种对理性解释的追求决定着西方文化的思维取向,同时也开创了希腊逻辑学的优良传统。

冷静的理性主义和积极的现世主义、自然质朴的审美情趣和生气勃勃的人本主义、爱智思辨的批判态度和自由平等的公民意识,不但化育了人类史中别具一格的完善丰满人格,也成为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正是这些精神,在强烈影响西方文明发展走向的同时,更塑造了西方文化心理中诸如人定胜天的不假思索的乐观主义,及万物为我所用的侵略性的实用主义等典型特征。而西方文明的这些特征,与中国强调天人合一的和谐平衡论及物我两忘的离散型宇宙观形成鲜明对照,而其中的差异更决定了两种文明各自选择科学扩张和修身泥古的不同发展方向。

在古希腊,人们以自然为对象的科学研究并不以实用为目的,而是以求知为动机的深刻思考。所谓的“知者”^①文化使古希腊学人视求知为人

① “知者”即“智者”,爱智慧的人,希腊文明根植于对智慧的诉求。而相对来说,中国文化更偏重于对生命、宇宙的体悟,如《论语》中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类的本性。求知是对事物、现象的根本原因和原理的探寻、认知。探寻与认知的领域不仅包括语言、艺术、伦理、政治,也包括自然界的种种奥秘。因此,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热爱科学的,早期的哲学家几乎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亚里士多德更是古希腊科学知识的集大成者。在世界三大逻辑传统中,希腊逻辑传统达到了最高的成就,现代逻辑就是从这一传统发展而来的。希腊传统形成于古代希腊,一直延续到近代西方。古希腊最早出现的逻辑系统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

古希腊的科学技术思想虽然也有过类似的带有直观性的整体性思维,但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走向了抽象和形式的认知方式,不以实际应用和效益为惟一目的,而要做一种更为抽象的、理论的思考与探索。古希腊文学为亚里士多德构建逻辑学说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思维素材及朴素逻辑思想,因此,古希腊文学是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说产生的土壤,古希腊文学的繁荣铸就了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说的辉煌。

逻辑是关于推理的科学,而推理一般只有通过丰富的具体推理材料进行抽象和概括才能获得。这些特殊和具体的推理材料大量存在于科学技术思想以及谈说论辩之中。因此,逻辑的产生和发展与科学技术及谈说论辩密切相关,脱离不开这二者的影响。Logic 一词源于古希腊语 λόγος(Logos)。亚里士多德在定义三段论时虽然曾用过 λόγος 这个希腊字,但他只是在“议论”或“论证”的意义上使用它。他没有用 λόγος 这个希腊字表示逻辑,他是应用分析或分析学,表示关于推理的理论。关于推理的理论是逻辑的核心部分,因而可以说他是用“分析”或“分析学”表示逻辑的。

在亚里士多德时代,逻辑学有时被称作“辩证法”,有时被称作“综合论法”。建立三段论理论,是亚里士多德对希腊逻辑传统的最重要的贡献。科学技术对逻辑有更重要的意义,亚里士多德逻辑的性质完全是方

法论的,是一切科学工作的一般工具。这样的逻辑,离开科学技术的发展是难以产生的。亚里士多德的成就告诉人们,古希腊的科学技术是有其自由发展的广阔天地的,他们自由地思考着世界的性质和生活的目的,而不为任何因袭的正统观念的枷锁所束缚。

继亚里士多德之后出现的麦加拉-斯多葛学派逻辑,是古希腊逻辑的另一高峰,这一学派的最大成就是构造了一个命题的公理系统并深入讨论了模态概念“必然”与“可能”的问题,他们给希腊逻辑传统增添了新的重要内容。

中世纪逻辑也是希腊逻辑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欧洲中世纪经院逻辑家主要是从阿拉伯人那里继承了古希腊的逻辑成果。因此,阿拉伯逻辑也是中世纪逻辑的一个组成部分。大约 12~15 世纪,欧洲经院逻辑继承和发展了古希腊和阿拉伯的逻辑思想,建立了完整的经院逻辑体系,从而对希腊逻辑传统做出了重要贡献。经院逻辑明确区分了范畴词(categoremata)与非范畴词。范畴词,它能用作的主项和谓项,这是严格意义上的词项;非范畴词,这类词要结合范畴词才能表意,自身不具有独立的意义。如“每一”、“无一”、“有的”、“并且”、“只有”、“或”、“如果,则”等等。范畴词是命题的实质成分,指称语言外的某个对象,如“人”、“红的”;非范畴词是命题的形式成分,在通常意义上没有所指,它在命题中仅起逻辑的作用,用以改变或修饰范畴词的所指,决定命题的形式。从现代观点看,非范畴词相当于逻辑常项或算子(命题联结词和量词),范畴词则是非逻辑词项。18 世纪末,康德创造了“形式逻辑”这个名称。有证据表明,黑格尔之所以把他的主要哲学和认识论著作命名为《逻辑学》,是受到康德的影响。但也正是在黑格尔之后,“逻辑学”这个名称才被叫响了,成为思维与论证这门科学的专称。

中国古代文化是一种区别于海洋民族的大陆民族文化,是一种与中

世纪欧亚的等级制度和印度种姓制度相出入的宗法制度的文化。地理环境的、生产方式的、社会组织的这三个层次的格局,决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类型,这种特定的文化特征,形成了中国的逻辑传统。

先秦文化的主要内容是社会伦理尺度与治理国家纲纪的建立和实践。而这些伦理尺度和治国纲纪所体现的,不外是处于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不同人群及其代表有关社会人事方面的种种主观愿望、理想和信念。与这种文化的总体特征和主要内容相适应,形成了先秦时期以伦理政治为核心、以人们的现实需要和实际经验为依托的思维取向。

这种思维取向在先秦的科学技术中有明显的表现。先秦科技重应用,重经验而轻理论,数学多为应用问题的解法集成。先秦文化,包括它的科学技术及数学的总体特征,主要内容与思维取向,使说明及说服的方法受到高度重视,却没有对严格、精密、有效和普遍适用的科学证明方法提出强烈需求。

中国古代没有发展出类似亚里士多德所创建的严密的三段论体系。战国后期的《墨经》曾有过关于“推类之难”的讨论,《荀子》也有“推类而不悖”的说法。这是用“推类”的专门术语对中国古代的推论方法所做的概括。对于“推类”,《墨经》提出“异类不比”,可见,“推类”是以事物间类同关系为依据的推论,十分注重对事物间同类关系的认识,即所谓“知类”、“察类”、“明类”,以防“殊类”使推论走向谬误。然而“推类”缺乏对推论形式的规范抽象和对推论规则的系统说明。

在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①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墨家逻辑,是中国古代最为全面系统的逻辑体系,是中国逻辑史的典型和重镇。墨家逻辑是中国

^① 轴心时代是20世纪20年代哲学家雅思贝尔斯在他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里提出的概念。他说,从公元前600年左右到公元之交的600年时间以内,在旧大陆的三个文明地区,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批伟大人物,而这些伟大人物基本奠定了这三种文化的精神脊梁。